

范剑平:中国经济新周期面临两大拦路虎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在为《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3年春季论坛》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阶段,在未来10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仍然可期。预计到2015年,城镇化将和出口转好因素共同推动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增速达到10%左右。

范剑平认为,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来说并非“强心剂”,而是长达十年的长远规划。他推算,如果城镇化率从目前的51%提高到65%,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难得机会,关键是能否利用这个机会,使中国从劳动力低成本资源驱动模式转变为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科技研发能力增强的创新驱动模式。

在范剑平看来,新型城镇化有两个政策要点,一是在硬件建设方面,即通过扩大投资,集中建设城市群;二是在软件建设上,通过扩大消费,解决3亿农民家庭的市民化。

范剑平认为,城镇化规划中科技元素应用越充分,城镇化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就越大,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越强,促成中国经济发展升级版梦想成真。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范剑平指出,2013年,中国刚刚开始进入新周期的门口,却面临两大拦路虎。一是物价,另一个是房价。范剑平认为,与前两轮周期不同的是,本轮物价起点太高。此前两轮,都是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结束调整,开始进入新周期,相对于负的百分之一一点的物价水平,通胀目标3%,留给宏观政策超过4个百分点的空间,可以放心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而2012年物价已达2.6%,即便今年对通胀的容忍度已经提升到3.5%,也仅有0.9个百分点的幅度留给政策,这就决定了本轮经济上升期,不能像过去那样,放心大胆地

搞扩张,因此,一开始就把通胀作为主要威胁,小心翼翼地微调,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好起来,又要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对于另一个更为厉害的拦路虎“房价”,在范剑平看来,已经不能再高了。而且,前两轮周期,房地产是主角,本轮周期却要实现一个没有房地产作为主角的经济上升期。这需要严格货币纪律,匹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减轻地方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此同时,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范剑平认为,今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极其有限,但尽管如此,经济也能实现8%以上的增速。

贾康:提升直接税比重 扩大房产税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必须正视我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偏低的问题,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制,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还要积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与赠与税问题。

他认为,如果考虑加快财税改革,当前有三方面的重点事项无可回避,必须紧紧抓住。首先是要加快“扁平

化”框架中的省以下分税分级体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解产生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巨量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的制度性原因。于深化改革中逐步达到财权与事权相适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境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加快资源税及相关配套改革,促进节能降耗和可持续发展。贾康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受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趋收紧,但发展方式仍明显带有粗放特征,节能降耗、加快方式转

变的实质性进展远不能令人满意,一大重要原因,是基础能源产品和初级产品的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仍严重扭曲。

贾康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抓住我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量改从价”改革在新疆启动后2011年末已推广至全国,而近期物价走低和煤炭“双轨”价格自然并轨的时机,顺势扩大这一改革的品种覆盖面,特别是对我国最大宗能源——煤炭,应尽快实行此项改革。

第三,加快我国直接税建设步伐,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凸显和负面影

响,优化再分配机制和房地产调控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共同富裕。

贾康认为,必须正视我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偏低的问题并充分利用税改中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的“可塑性”空间,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来加强“超额累进”调节机制。在他看来,直接税制建设情况复杂,既得利益阻力明显,改革任务艰巨,但属于不能回避的制度建设任务,也是促使我国房地产业等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下决心攻坚克难,渐进达成。

高培勇:今年财政赤字过半应用于结构性减税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今年宏观调控要实现扩张性的操作,主要是靠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应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推进。

高培勇认为,通胀压力的存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今年货币政策难有作为空间。在此情况下,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任将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

上。这意味着,今年的扩张性操作,积极财政政策要作为主力部队而担负起“主攻手”的角色。

高培勇说,积极财政政策不外乎从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入手。从增加赤字来看,2013年,通过举债弥补的财政赤字12000亿元,加上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赤字1000亿元,整个财政预算赤字水平,达到了13000亿元。这个赤字水平,比2012年增加2300亿元。

他指出,今年的经济低速走势更

趋明显,受此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而由于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有可能更加凸显。

在既定财政预算赤字的约束下,可以有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两种操作。高培勇说,一笔特定数额的财政赤字,既可以支撑减税,也可以支撑扩支,亦可以同时支撑减税和扩支。一般而言,扩大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扩张性效应。减少税收较之扩大支出,则带来的扩张性效应相对较小、相对间接。

考虑到兼容双重作用、兼顾多重目标的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可以认为,201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也必须以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心。”高培勇说。

事实上,从2012年下半年起,结构性减税已经演化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高培勇说,进入2013年,这种格局不仅不会、也不应有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应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推进。

马晓河:消费替代投资拉动增长需消除多重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瓷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近中期我国消费难有大的增长,特别是让消费替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有许多障碍因素需要消除。

马晓河说,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既有动力又有空间。在“十二五”的后三年,投资高增长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在他看来,近中期我国消费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既有体制、政策因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

等因素。

首先,我国的国民收入政策不合理有利于高投资,不利于消费增加。收入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方面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比如,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在调整后的再分配格局中,都是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的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我国的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利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低收入群体,但是,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标准低,制约居民消费。而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再次,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决定了社会储蓄率要上升,消费率要下降,这也是消费难有大的上升的制约因素。

马晓河强调,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

系变动是有规律的,消费快速增长、消费率的持续上升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到来。但是,同投资相比,我国的消费增长确实偏慢,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偏小。

马晓河建议,今后一段时期应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两个方面采取措施调整需求结构,控制不合理和超越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投资需求,纠正消费增长偏慢、消费率偏低的现状,以此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需求结构的调整。

滕泰:解除供给抑制 释放中国五大财富源泉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面对中国经济积累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应该从供给端着手,通过制度改革,解除供给抑制,解放中国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说,过去十多年,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就会较多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踩油门“刺激经济;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又会受到货币主义的影响和压力,被迫“踩刹车”紧缩。决策部门长期被周期性调控政策吸引了注意力,就难免忽视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同时,

长期靠踩刹车,踩油门,经济会有问题,调控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滕泰指出,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强调改革,强调未来十年保持7%的增长,此时“新供给主义”的战略意义就比较明显。新供给主义主张更多地从供给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滕泰认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

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所谓五大财富源泉:

一是人口和劳动力。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二是制度。很多垄断的国有企业占有的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

源。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四是资本。为什么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制造了最贵的资本价格,这就叫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的14%~15%降低到5%,可以想象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命力。

五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刘纪鹏:对症下药提振股市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3年春季论坛》上表示,股市应成为奠定中国梦的第一块基石。只有股市发展起来,人们才能重拾信心。他建议,监管层应对症下药,提振市场信心。

刘纪鹏认为,从全球整体经济形势来看,美国、欧洲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债务高企,但唯独中国不缺钱。以中国目前欠债少、经济增速数倍于美国的现状看,中国股市13倍左右的市盈率是非常不正常的表现。

在刘纪鹏看来,信心最为重要。现在,国内资金都往外跑,企业家根本不住实体经济里投资,股市跌到2200点,而股民对利好政策置若罔闻,尤其房地产价格在多轮调控政策下,仍然飙升,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信心不足。因此,要下决心实实在在地解决实际问题,优化再分配机制和房地产调控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共同富裕。

刘纪鹏呼吁,监管层必须对症下药切实提振股民的信心,因为信心对于市场至关重要。投资者没有信心,汇金公司再增持股票几次也没有用”。他说,当前股市现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股民亏损,而少数人通过股市融资实现暴富,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政策性因素,主要是股票没有按照市场化制度发行。

刘纪鹏强调,纠偏矫正要靠监管部门的政策。期待监管层开门倾听各界的意见,推出股市新政,让投资者重拾信心。

朱中一:城镇化提法适当降温有好处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认为,房地产调控难度很大,调控应立足于怎样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制度结合起来,不要就房价而调房价。房地产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定位应是一个基础性或配套性的产业,不要过分强调支柱产业。

朱中一指出,房地产调控难度很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定位的问题,房地产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在经济不理想时总是想方设法对房地产寄予希望,而非经济情况好时或房价上涨过快时又非常强调民生。二是房地产这十几年来快速发展,但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做,包括每家每户的房产基本数据不足,造成了制定政策的难度,这也是房地产税不易征收的原因。三是房地产调控的复杂性,房价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包括流动性过剩问题,土地供应能否跟得上的问题,

地方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问题,土地财政跟中央政府的财权问题,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等。朱中一建议,调控应立足于怎样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制度结合起来,不要就房价而调房价。但对于有些人的“空调”论他并不赞成,他认为调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个挤泡沫的过程,如鄂尔多斯、温州的泡沫明显存在,肯定要击破的。

对于备受关注的新型城镇化问题,朱中一认为,尽管城镇化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拉动消费,但过分强调城镇化又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投资热问题,因此对于城镇化的提法适当的降温是有好处的。

朱中一强调,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房地产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先导型基础性的产业,是为相关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产业,不要过分强调支柱产业。房地产发展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和相关产业发展相协调。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利率市场化真正实现后,金融生态将发生改变,金融的运行机制也将发生变化。但金融市场内在的脆弱性并没有消除,仍需要通过监管和调控,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陈道富认为,利率市场化应该包括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从国内市场来看,需要建立较为市场化的机构、业务、产品准入和退出机制,使得利率水平不仅反映有限的市场主体,在有限业务和产品范围内的供求关系,而且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判断、偏好和选择。市场上也需要存在较为顺畅的退出机制,允许金融机构能用脚投票”。

陈道富指出,有必要建立与利率市场化后金融运行机制、金融生态相协调的监管和宏观调控体制。具体来说,一是需要前置性、行政性干预,转变为事后审慎监管。由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自主承担和管理微观金融风险,监管部门专注于行业风险管理,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

题,推出好政策,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空间仍然相当巨大。

刘纪鹏指出,在经济领域,稳增长就要继续发出宽松政策的信号,绝不能再紧缩了。而化解宽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就要依靠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因此,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对当今中国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更对中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占领战略制高点至关重要。

刘纪鹏呼吁,监管层必须对症下药切实提振股民的信心,因为信心对于市场至关重要。投资者没有信心,汇金公司再增持股票几次也没有用”。他说,当前股市现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股民亏损,而少数人通过股市融资实现暴富,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政策性因素,主要是股票没有按照市场化制度发行。

刘纪鹏强调,纠偏矫正要靠监管部门的政策。期待监管层开门倾听各界的意见,推出股市新政,让投资者重拾信心。

陈道富:建立适应利率市场化金融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利率市场化真正实现后,金融生态将发生改变,金融的运行机制也将发生变化。但金融市场内在的脆弱性并没有消除,仍需要通过监管和调控,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陈道富认为,利率市场化应该包括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从国内市场来看,需要建立较为市场化的机构、业务、产品准入和退出机制,使得利率水平不仅反映有限的市场主体,在有限业务和产品范围内的供求关系,而且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判断、偏好和选择。市场上也需要存在较为顺畅的退出机制,允许金融机构能用脚投票”。

陈道富指出,有必要建立与利率市场化后金融运行机制、金融生态相协调的监管和宏观调控体制。具体来说,一是需要前置性、行政性干预,转变为事后审慎监管。由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自主承担和管理微观金融风险,监管部门专注于行业风险管理,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

累积。二是要将机构为主的分业监管,转变为功能性的综合性监管。利率市场化将推动金融市场的融合,业务融合乃至机构融合将成为趋势,为此,需要转变以机构为重点的分业监管模式,探索建立以功能为主的综合性监管,加强监管协调。立法上也应做相应的转变,以功能为主构建金融法律体系。

三是货币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业务融合将模糊货币的边界,也使得数量管理难度较大,有必要转向基于价格的间接调控体系。

陈道富表示,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将会涉及数量和价格均衡机制的重新平衡问题,还会存在不同市场的重新均衡,甚至存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调整适应,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所有这些调整过程,都需要通过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和机制实现,需要时间和机制保证。这些调整过程,不仅有微观影响,还存在总量意义上的宏观影响。为此,需要全面考察利率市场化过程可能产生的微观和宏观影响,设计好整体的调整框架。